
● 胡逢祥 张文建 著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21209012

(沪)新登字第201号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胡逢祥 著
张文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淮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310千字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3,000本

ISBN7-5617-0663-4/K·060 定价: 5.55元

序

汤志钧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中西冲突，反映在史学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思潮、新变化。

西方学说的引进，冲击了传统史学。鸦片战争时期，已有人提出，学习“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20世纪初，史学界有一股编写“中国通史”的热潮，有人主张按照“西人著世界史”，分中国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不以一朝为一史”（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有人主张通史应“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和“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从历史观到方法论都有探讨。民国以后，更有对古史持怀疑态度的疑古派和受西方影响的实用主义史学，波澜起伏，互争短长。

近代史学，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由研究中国史而研究世界史，由研究内地史而研究边疆史，由研究以汉族为主的历史而研究少数民族史，由研究政治史而研究社会史、文化史，由研究古代史而研究当代史，由注意文献资料而注意考古发掘，等等。视野更加广阔，领域日益扩张。至于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以至专记典章制度的史书，也卷帙繁多，品类丰富。

然而，要把近代史学思潮以及各流派系统阐述，分析综合，却很不容易，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专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

研究所胡逢祥、张文建两同志所撰《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一书，可说是填补了这个空白。

本书不象一般史学史著作那样，以某一史家某一史著立论，而是根据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史学思潮的变迁对史学的发展加以论述，这样，使人有比较清晰的近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观。同时，它又根据“中西冲突”的时代特征，注意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来把握中国近代史学的特点，这也可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本书条理明晰，文字清顺，不但是中国近代史学史教学的一本参考书籍，而且对青年同志步入史学也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籍。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

- 第一节 晚清史学主潮的演变……………(20)
 - 一、清代考据学的盛衰……………(20)
 - 二、晚清社会危机与经世学术……………(25)
 - 三、传统史学内部的分化……………(29)
- 第二节 西北史地学的兴起……………(34)
 - 一、西北史地研究风气的形成……………(34)
 - 二、张穆与《蒙古游牧记》……………(40)
 - 三、何秋涛与《朔方备乘》……………(46)
- 第三节 开眼看世界的外国史地探讨……………(52)
 - 一、从反侵略到“开眼看世界”……………(52)
 - 二、中国第一部世界史地志——《海国图志》……………(60)
 - 三、梁廷枏和徐继畲的世界史地研究……………(66)
- 第四节 蔚为风气的当代史著述……………(74)
 - 一、突破私家撰修当代史的“禁区”……………(74)
 - 二、《圣武记》对清史的开创性研究……………(78)
 - 三、鸦片战争史研究的繁兴……………(82)

第二章 洋务思潮影响下的史学

第一节	洋务思潮与史学·····	(90)
一、	洋务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90)
二、	“增其新而不变旧”的洋务史学·····	(91)
第二节	“中兴史”和外交史的编纂·····	(94)
一、	“中兴史”编著热的出现·····	(94)
二、	“夷务”和外交史编纂·····	(99)
第三节	探求“富国强兵”的科技史和军事史著·····	(106)
一、	科技史译著的发轫·····	(106)
二、	军事史书的出现·····	(109)
第四节	走向世界的外国史地考察·····	(113)
一、	从“开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	(113)
二、	“借法自强”和外国史地考察·····	(117)
第五节	光绪朝的元史学·····	(124)
一、	光绪朝的元史学及其流派·····	(124)
二、	考证派对元史文献的整理研究·····	(127)
三、	曾廉和柯劭忞的《元史》改写·····	(136)
四、	屠寄与《蒙兀儿史记》·····	(142)
第六节	来华传教士的史书编译及其影响·····	(149)
一、	近代早期传教士的史书编译·····	(149)
二、	从“广方言馆”到“广学会”·····	(154)
三、	传教士史学的思想倾向·····	(161)
四、	传教士的史学活动与西方史学的输入·····	(170)

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第一节	新史学思潮和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	(174)
一、	新史学思潮的兴起·····	(174)
二、	新史学的宗旨·····	(178)
三、	新史学的初步实践·····	(183)
第二节	西方史学的输入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188)
一、	西方史学传入的最初途径与内容·····	(188)

二、社会学和历史学·····	(192)
三、近代史学专业理论的输入及其影响·····	(200)
第三节 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	(211)
一、梁启超的史学道路·····	(211)
二、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体系·····	(215)
三、梁启超史学的时代特点·····	(224)
四、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成就·····	(230)
第四节 资产阶级的外国史研究·····	(237)
一、戊戌变法时期的外国史介绍和研究·····	(237)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外国史编译和研究·····	(241)
三、近代中国在认识世界道路上的飞跃·····	(251)
第五节 新式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编著·····	(256)
一、清季学堂的兴起和历史课程设置·····	(256)
二、历史教科书的出现与发展·····	(256)

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思潮

第一节 国粹史学的形成·····	(272)
一、国粹派和国粹史学·····	(272)
二、国粹史学的灵魂——民族主义·····	(277)
第二节 国粹派的治史方法与学术成就·····	(281)
一、国粹史学与西学·····	(281)
二、国粹史学的学术成就·····	(287)
第三节 国粹派的“民族文化论”及其局限·····	(291)
一、文存则国存，学亡则国亡·····	(291)
二、国粹派之归趋·····	(294)
第四节 国粹史学的巨擘章太炎·····	(298)
一、章太炎的史学观点与方法·····	(298)
二、文化史的研究与历史民族大义之阐发·····	(302)

第五章 “五四”时期的史学思潮和流派

第一节 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新趋势·····	(309)
-----------------------	-------

一、新文化运动与史学的发展·····	(309)
二、西方现代各派史学的涌入及其影响·····	(310)
三、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	(316)
第二节 反封建的疑古史学·····	(320)
一、辛亥后的复古主义回潮·····	(320)
二、疑古史学的兴起·····	(322)
三、疑古派和信古派的论争·····	(325)
第三节 考古派史学的继起·····	(328)
一、王国维的考史方法和实践·····	(328)
二、陈寅恪的新考据学和历史研究·····	(332)
三、李济与我国现代考古学·····	(336)
第四节 实用主义史学的流传和衍化·····	(338)
一、胡适的实用主义史学观点·····	(338)
二、何炳松与鲁滨逊的“新史学”·····	(341)
第五节 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通俗史学·····	(346)
一、东西文化论争和中国文化史研究·····	(346)
二、通俗史学的推广·····	(350)
第六章 曙光初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第一节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354)
第二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359)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建立与发展·····	(364)
后记 ·····	(371)

绪 论

一、近代社会大变动与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兴衰递变，是和整个风云激荡的近代社会大变动息息相关的。

中国古代，素有“乱世多史”之说。这不仅因为，一般在封建中央集权制较为强固和社会相对凝滞少变的时期，学术思想界因受统治者的严厉控制，常易呈一家独尊、万马齐喑的沉寂之局；更主要的是，史家长期处于平静安稳的环境中，缺乏历练，难以产生深刻的史学思想，故史学尤其是历史理论大多不甚发达。而在社会大变革或大乱之后，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相对削弱，对思想界的控制亦较为松弛，往往易萌发新的观点和出现带有总结性的历史著作。特别是沧海横流的社会巨变和颠沛坎坷的经历，常激起人们对历史和各种人生现实问题的思索，从而推动史学的发展。如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促进了诸子百家历史观念的发达；秦汉之际的王朝兴废，使汉初产生了贾谊等人的杰出史论和司马迁《史记》那样不朽的史学宏篇；魏晋南北朝时社会长期动乱，但史

学却十分活跃，不仅史书数量多、体例繁，且内容广泛，包括通史、断代史、典制史、传记、谱牒、风俗志和地方志等各方面；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更造就了具有启蒙色彩的一代大史学家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并出现了浙东史学这样影响深远的史学流派。可见，社会的风云变幻，是何等直接地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进程。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开始急速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主权逐渐丧失，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封建自然经济日趋瓦解。与此同时，在外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冲击下，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则有了较前为快但却畸形的发展。与近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相应，作为意识形态的史学，因受时势激荡和逐步输入的西学——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也开始了一系列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转变。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史学，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从性质上讲，都未越出封建文化的范畴。而在近代，史学发展的主流却第一次显示出摆脱封建传统故道而朝着资产阶级方向逐步演进的趋势：历史研究的目的，渐由为封建统治提供“资鉴”而转向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及新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利益服务，要求编写“民史”、“社会文明史”、“人类资治通鉴”以取代“帝王教科书”的呼声日高；长期以来在史学界居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唯古是崇观念不再为许多人尊信，而肯定社会变化进步的历史变易观和进化论却日渐流行；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格局日益被冲破，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一些与现实直接有关的课题更成为史学界探讨的重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和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治史；在史书体例、文字等表现形式上，也日趋大众化和通俗化。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更把中国史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科学化的方向。

中国史学在近代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开始逐步改变其在传统学术中作为封建政治学——经学的附庸地位，走向学科独立化。

中国古代，史为包举各种人类知识的总称，史官代表统治者垄断了一切文化知识。据《周礼》记载，周时官方设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职，掌内外一切文字记载之事。“史也者，一代盛衰之所系也，即一代学术之总归也。”^① 故龚自珍认为，周之世，“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② 梁启超也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③ 自汉至清二千年间，总天下学术为一的状况虽有所改变，然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专制制度起见，运用政治权力，定儒家经学于一尊，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整个封建学术的层次结构和主从关系，使史学与其他学术均降为经学的附庸。《汉书》以后历代官颁正史的倾向自不消说，即私家修史，亦多有以“载道”和“羽翼经训”相尚者。宋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此风益盛。如范祖禹的《唐鉴》，便因贯注了不少理学观点而大为程颐称赞，以为“三代以后无此议论”，“足以垂世”^④。朱熹更是力主：“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浙东学派的吕祖谦因提倡读史，稍稍偏离了这一轨道，便被朱熹斥为舍本逐末，“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⑤。其《通鉴纲目》之作，即是这种以经贯史主张的实践。封建史学对经学的依附特性，一方面形成了崇尚“春秋笔法”、讲求“经世”的深厚传统，同时也限制了它本身的独立发展。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最后崩溃，作为封建政治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的经学，也渐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依

①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第47页，见《刘申叔先生遗书》。

②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见《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0页。

④ 《二程外书》，卷十二，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3、439页。

⑤ 见《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据，日趋衰落。于是，史学始得逐步挣脱经学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史学的社会作用和独立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近代早期的龚自珍，在当时一般士人尚心营目注于经学时，便针对“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绌”的流俗之见，力倡“尊史”说，以为今日之所谓“经”，不过是古代之史，史学乃关系国家盛衰之学，故“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纪纲，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②资产阶级史学兴起后，更十分强调史学的重要性。梁启超提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③马叙伦也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史者，所以纲维群物而条具事理者也。是故一朝之典故，一代之政俗，而盛衰之由、沿革之数、民族之原、教化之本、人物之繁、食货之重，莫不史乎系之。”^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与宋明以来某些学者提倡的“六经皆史”说，虽同是要求提高史学的地位，出发点已大为不同。后者之重史学，大多是从经史同源的角度去体会的，即认为经史作用相同，唯表达“道”的方式不同罢了，所谓“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⑤；“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⑥其意仍在加强经史一体化，或将史学纳入经学的精神轨道。而史学之在近代受到高度重视，恰恰是以承认其学科的独立性为前提的。

如王国维在1904年就提出，学术研究应超越利害关系之外，而

① 龚自珍：《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81页。

②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22页。

③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

④ 马叙伦：《史学存微》，见《国粹学报》，1906年第19期。

⑤ 《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⑥ 李贽：《经史相为表里》，见《焚书》，卷五。

不应视为道德、政治之手段，其所求乃“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如专重一时之功利，“求以合当世之用”，有时反会自失其价值。^①与此同时，章太炎也认为：“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者。”^②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兴起，这一观念在学术界更为滋漫。如顾颉刚认为：“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③甚至连一向十分强调以学术经世的梁启超这时也表示：“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④

这些议论表明，两千多年来传统学术结构层次的坚冰已开始被打破。它的实质，显然不在于一般地否认史学的社会功用，而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其充当封建政治御用工具的传统，摆脱经学或其他封建政治因素的束缚，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挥其社会作用，以便为新的资产阶级现实利益服务。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国

①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见《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转引自杨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237页。

③ 《古史辨自序》，第25—26页。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1页。

学术走出中世纪而跃入近代天地的过程中都有惯例可见。英国当代史家蒲朗穆(J. H. Plumb)就说过:“自文艺复兴以降,史学家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之往事,为了解而了解,非为宗教,非为国运,非为道德,亦非为神圣化之制度……史学家日趋于窥探往事之真相,而冀自此建立有历史根据之社会转变之轨迹。此为—西方之发展。”^①在日本近代,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为反对明治政府对学术或信仰自由的侵害,也屡屡发出过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他们提出“学术应该是独立的,学理应该是普遍性的,知识思索应超越于政权、教权之外,丝毫不允许受到它们的压制。”^②如果说,这种学术主张的用意,是在以艺术超脱、学术独立等“超阶级”的口号来要求摆脱封建政治对其的控制,是个性解放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理性思想在学术领域的折光的话,那么,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上述主张,显然也具有这种积极的意义。如王国维在提出前述看法的同时就指出,学术研究首应冲破儒学的价值观念体系,因“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③他还要求改变那种“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的治学宗旨^④,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治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⑤

诚然,“为历史而历史”,希望学术研究完全超脱于政治或现实利益,这种观点今日看来并不正确,也不符合实际。但在当时,这些反传统观念的提出,对于克服旧时代学术过分依附于封建政治,缺乏独立意识的弊端却是一种必要的针砭和“矫正”,对于确立我

① 蒲朗穆:《过去之死亡》(The Death of the Past),第12—13页。

② 田冈佐代治(岭云):《政权对学理的迫害》(1902),转引自须川照一《王国维与田冈岭云》,见《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页。

③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见《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

④ 《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

⑤ 《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

国近代学术形态和健全史学的学科独立发展机制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当然，史学在近代的学科独立化，是经过了相当一个时期的发展才完成的。大抵五四运动以前，这种倾向只是不断加强，但经史仍时相混杂，史学发展并未完全摆脱经学的羁绊，如一些有影响的史学家魏源、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等，同时又是经学家，其史学思想往往带有很浓的经学门户色彩。直到五四以后，随着旧经学退出历史舞台，史学才真正获得了独立发展。

任何时代史学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反映。中国史学的上述具有近代意义的转变，便带有深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烙印。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因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地位，决定了其文化形态的不健全。这一时期的史学虽然表现出近代化的趋势，但旧的封建史学仍保持着相当的阵地和影响，封建复古史学思想在近代屡屡泛起，一些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夏曾佑等，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文化意识。另一方面，也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其无法承担创立自己成熟的近代史学体系的任务，而只能借助大量输入和移植西方史学理论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并由此形成其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很深的依附关系和缺乏独创的时代文化特征。

近代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异常尖锐及交相起伏，还使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西学和传统中学、民族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农民阶级思想和地主阶级统治思想之间的剧烈冲突呈现一种多极交锋的势态，从而使史家的思想也往往带有多元的矛盾性格。不少史家的史学思想虽表现出基本的阶级倾向，但又夹杂着其他阶级的思想成份：或以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为主，而杂有封建残余意识；或坐守封建史学的藩篱，而受到一些近代治学方法影响；或始终处于变幻不定之中。有的史家，昨日还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今天却堕为复古史学的鼓吹者；有的虽

一度抱残守缺，后来却追步时代的潮流，跃入进步史家的行列。即使是代表封建保守势力的史学阵营，也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加速发生分化。有的史家，政治感情是封建的，治学方法却吸取了不少近代的东西；也有的虽不肯丢去沉重的封建文化包袱，但也在蹒跚而进。这种新旧杂陈和曲折多变，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特有的纷纭错综的斗争情状。

史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方式，其发展还与各时代科技水平、风习时尚、社会思潮、民族心理、传统文化惯性等其他人类文化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关系。故探究史学在近代社会大变动中的地位及其更新轨迹，既不能孤立地就史学论史学，也不可满足于单纯讨论其与经济、政治的一般相互作用，而应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广阔背景上加以考察。

中国近代因民族危机而激起的爱国救亡思潮，曾深深地影响到史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一种以滋养爱国观念为任的史学传统。中国近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进攻下，由封建闭关自守到被迫开关走向世界后，一向以天朝自尊、沉浸在古代文化辉煌成就优越感里的中国人，突然发现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由此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和失重感，使不少人常陷于自尊与自卑的内心冲突之中。这种民族心理的不平衡，导致近代中国人对先进的西学表露出一种既钦羡又疑虑的态度，在西方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之时，其疑虑更为强烈。这便是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倡导输入西学（包括史学）的同时又喊出“保存国粹”口号的原因。

至于传统文化惯性对近代史学的影响，更为明显。史学所以一度成为近代最活跃的一门学科，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旧有的内涵结构有关。中国的传统学术，按旧式分类，大抵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层次论，经学居首，史、子、集次之；以内容论，经、史较相近且稳定，子、集较庞杂。由于儒家观念的支配和封建科举制度的需要，对一般士子知识构成影响最大的，实为经史，余则多被视为“小道”。

因经学在封建政治中的特殊作用，每当社会出现变化时，经学总是首当其冲受到波及并作出反应。儒学在中国古代所以历经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的变化，原因就在这里。鸦片战争前后，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宋学首先遭到抨击和今文学的时兴，也反映了经学在社会大变动中作出的自我调整。龚自珍和魏源等人利用今文学的微言大义讥切时政，虽有震动人心、开启一代新学风的作用，然其本意固不在否定封建制度和经学，而是试图通过今文学的复兴来完善这一封建政治学的理论，以便挽回封建制度江河日下的颓波。康有为提倡经今文学的用意虽与龚、魏有所不同，在于利用它为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服务，但他也确实希望通过那套“改制”学说，使古老的经学焕发出新的生命，甚至提出过建立孔教并定其为国教的主张。不过经学的内容和形式毕竟太陈旧僵化了，无法适应性质已在变化的近代社会需要，故这种改造经学的活动只能归于失败。与此不同的是，作为传统学术的史学，却表现出较大的社会适应性和更新能力，这就使一些旧知识分子在经学衰落时，自然而然将注意力转向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的史学。在一些人看来，“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唯史学”^①，认为通过引进现成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便可将传统史学改造为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学术形态，于是群趋于治史。这种倾向，在20世纪初年显得尤为突出。

此外，考察近代史学，还应注意其在社会大变动中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的各阶级、各政治派别都十分重视史学的功用，用它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史学在推动近代社会进步思潮发展中的影响，更不可低估。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产生过深远影响；黄遵宪《日本国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介绍，促进了国内资产阶级变法改良思潮的发展；梁启超的不少史著，燃起过人们心头炽热的爱国情感；陈天华等人鼓

①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